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主編 趙玉榮 王金龙 戴淑平

国学精粹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国学精粹

主 编 赵玉荣 王金龙 戴淑平
副主编 种剑德 田显忠 高玉芬
安 勇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精粹 / 赵玉荣, 王金龙, 戴淑平 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57-2246-2

I. ①国… II. ①赵…②王…③戴… III. ①国学—通俗读物 IV. ①Z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6027 号

国学精粹

GUOXUE JINGCUI

主 编: 赵玉荣 王金龙 戴淑平

责任编辑: 李 莉 赵国山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雨 & 寒

出 版 人: 刘大年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广阳区九洲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43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2246-2/Z · 2246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呈现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向传统回归，西方文化提倡回归自然，东方文化提倡和谐、天人合一；二是世界趋向关注东方文化，尤其关注太极、中医、国学等东方传统文化，这透视出东方文化的深邃。

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开始由渗透至规模化进入中国，使东西方文化被反复比较取舍。西方文化规模化进入中国大致分为“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改革开放”。

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文化涌进国门，尤其西方伴随资本发展而爆发的“物欲趋利”文化跟随我国经济发展步伐，被迅速广泛传播，有人言必称“美国英国”，东方文化及民族文化逐渐退出主流，甚至遭到国民质疑。历经三十年，我们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荒芜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使我们漂泊的灵魂失去了归属；意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是根源文化。于是，国学文化逐渐复苏，甚至出现了国学热。

“国学”一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彼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中学”又称之为国学，如国画、国医等。从普遍意义上讲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国学，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应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道”的层次；另一个是“艺”的层次。“艺”的层次是指具体形式的文化现象，比如琴棋书画、诗歌、词曲等，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学”；“道”的层次是指学术层面、理论精神层面，也是传统文化中最精粹的东西，称之为国粹，属“上达”范畴。

所谓“下学”，是指日常生活中许多应用的东西；所谓“上达”，是指明白天命之理。许多学者认为国学更应该偏重于思想理论层面。实际上“下学”和“上达”是不可分割的，人明白了道理才会落实到实际生活的细节中；反之，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规矩，我们又要把它提升到对做人道理的认识上来。上达天命是知，下学人伦日用是行，知行结合，这就是广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即大国学。概括来讲，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的样式、信仰习俗。

狭义的国学指传统文化中的学术思想和道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及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又要奠定较全面的综合文化知识，尤其作为支撑中华民族未来的有生力量，更要了解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渊源及特色，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并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教材最鲜明的特点是力争放眼于大国学范畴，对大国学中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精选

集萃。本编写团队对我国目前各高校、高职高专、中小学、社会团体、民间文化组织及本地区的国学开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编者同时广泛阅读、吸纳了当今我国各高校、各文化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对国学的研究成果，本着“系统广泛，雅俗共赏”的原则，本书既可以作为向社会普及国学的读本，又可以作为各大综合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通识课教材。

本教材主要特点如下：

1. 国学文化的系统阅读普及性

本教材的编写体系具有对国学知识传承架构的系统广泛性，编写内容全面、系统地吸纳了各类国学专著的精华，并且设置了高屋建瓴与雅俗共赏融汇一体的体系架构。本书共分为四编：国学思想、国学典籍、国学常识、国学掌故。这四编的编写宗旨是：国学思想为精粹启迪；国学典籍为品读精华；国学常识为广泛涉猎；国学掌故为文化趣味追踪。

2. 高校通识课教材的实用性

第一编“国学思想”：对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及人格追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且对各家的思想给予了辩证地分析，这对于高校中正值多元文化冲击的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一种厘清，同时也再次传递了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及异域文化辩证唯物的文化传承观。

第二编“国学典籍”：从蒙学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到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选文除先秦经典国学源流文化外，又补充了国学普及的蒙学读物，同时对当今国学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及方式给予了一定的提示。

第三编“国学常识”：对政治职官、学制科举、语言文学、礼俗文化、民俗文化、神秘文化、文化图腾、国粹文化及国学大师作了较为简洁而全面的介绍。

第四编“国学掌故”：对皇室、官吏、科举、刑狱、婚姻、节日、礼仪、建筑、服饰、饮食、历法、地理、器物、文字、音乐等十五个方面，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对至今鲜活的华夏文化溯源寻根。

3. 编写内容具备史料的确凿性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吸纳了多位专家的国学专著精华。编写组多次会稿探讨，并进行甄别校对，本着尊重我国传统文化、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尊重读者、尊重广大师生的信念，为积极传播及品鉴国学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书由赵玉荣、王金龙、戴淑平担任主编，种剑德、田显忠、高玉芬、安勇担任副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兴菊、王金龙、田显忠、安勇、江善敏、赵玉荣、种剑德、高玉芬、戴淑平。本书由赵玉荣、王金龙、戴淑平负责设计本书编写宗旨、体系、体例的任务，高玉芬负责搜集资料及对各章节录入的工作。

本书虽然力求科学、准确、系统、实用，但难免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同人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赵玉荣

目录

CONTENTS

第一编 国学思想

第一章 儒家思想及人格追求	3
第一节 儒家思想 /3	
第二节 儒家的君子人格 /8	
第二章 道家思想及人格追求	12
第一节 道家思想 /12	
第二节 追求“清静无为”的道家“隐士人格” /16	
第三章 佛家思想及人格追求	20
第一节 佛家思想 /20	
第二节 追求“超凡脱俗”的佛家“随缘人格” /24	

第二编 国学典籍

第四章 蒙学典籍精选	31
第一节 明经学史《三字经》 /31	
第二节 奇才巧缀《千字文》 /50	
第三节 启蒙养正《弟子规》 /69	
第五章 儒家典籍精选	84
第一节 《论语》精选 /84	
第二节 《孟子》精选 /96	
第三节 《大学》《中庸》精选 /103	
第六章 道家典籍精选（《老子》）	109
第一节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109	
第二节 小国寡民 /110	
第三节 江海能为百谷王 /111	

第三编 国学常识

第七章 政治职官	115
第一节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115	
第二节 中国古代职官简介 /119	
第八章 学制科举	12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学制 /125	
第二节 古代科举制度 /129	
第九章 语言文学	133
第一节 古代汉语 /133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 /137	
第十章 礼俗文化	143
第一节 什么是宗法 /143	
第二节 古代祭礼 /144	
第三节 古代的丧葬习俗 /145	
第四节 出生礼 /146	
第五节 成人礼 /148	
第六节 婚聘礼 /149	
第七节 姓氏文化 /149	
第八节 名、字、号 /150	
第十一章 民俗文化	153
第一节 古代计时 /153	
第二节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153	
第三节 二十四节气与农历 /154	
第四节 天干地支 /155	
第五节 十二生肖 /155	
第六节 传统节日 /156	
第十二章 神秘文化	164
第一节 养生 /164	
第二节 阴阳 /166	
第三节 占卜 /168	
第四节 相学 /170	
第五节 风水 /171	
第十三章 文化图腾	174
第一节 神兽图腾 /174	

第二节 动物图腾 /177

第三节 其他图腾 /180

第十四章 国粹文化

184

第一节 古乐 /184

第二节 围棋 /188

第三节 书法 /190

第四节 国画 /193

第五节 中医 /196

第六节 戏曲 /198

第十五章 国学大师

203

第一节 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 /203

第二节 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冯友兰 /205

第四编 国学掌故

I. 皇室 /211

II. 官吏 /216

III. 科举 /228

IV. 刑狱 /233

V. 婚姻 /238

VI. 节日 /243

VII. 礼仪 /251

VIII. 建筑 /257

IX. 服饰 /261

X. 饮食 /263

XI. 历法 /265

XII. 地理 /268

XIII. 器物 /270

XIV. 文字 /273

XV. 音乐 /274

附录：中国历史朝代顺序及时间表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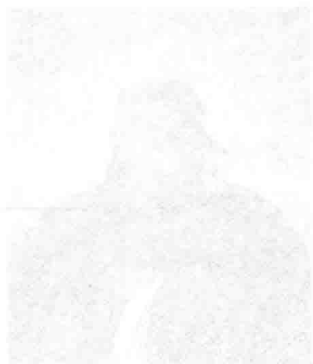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277

第一编 国学思想

国学思想文化是国学的精华，即“道”的层面。对中华民族浸润影响最大的国学思想主要包括儒、道、佛，其中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这三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颇深，且三家思想能够交融、互通、容纳在社会家国文化及个人灵魂中，成为灵魂信仰、行事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断塑造理想人格、培养理想人格的文化。从先秦时起，不同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便对理想人格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构想，提出并宣扬了各自的理想人格模式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甚至有些文化精英还在一定程度上践履了自己建构的理想人格。其中，儒、道、佛三家所设计和倡导的“君子人格”“隐士人格”“英雄人格”构成了中华民族人格文化最主要的成分，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人民的价值取向。而更主要影响国人人生价值观的是儒、道、佛三家。



第一章 儒家思想及人格追求

儒家文化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倡导孝、悌、中、和、忠、信、礼、义、恭、俭、让、敏、慎，其核心是“仁”。儒家文化推崇君子人格，把“修身”视作为人之本。儒家文化从汉代被立为正统之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文化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化能够延续不断的唯有中国，其原因就是中国有儒家文化这个经典文化系统。可以说，没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文化的烙印。

第一节 儒家思想

一、孔子生平简介

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刻苦好学。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创始人。祖籍宋国栗邑，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曾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四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现存《论语》一书，共二十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二、孔子的思想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以“礼”为治国手段，“礼”是“仁”的外化，具体形式为典章制度和等级规范，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推崇君子人格，强调孝悌，讲究忠信等。

（一）“仁”的学说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以前已有“仁”的概念，但作为哲学范畴的提出，却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

孔子的“仁”，其内容有四个含义：

(1) “仁者，人也。”认为“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2) “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3)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像尧舜一样“南面而已”。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他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4)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倡导以“孝悌”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甚至“仁”的精神也渗透到他的教育思想当中，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从“克己复礼为仁”这个角度而言，“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周礼的规范。但是，光是行为符合周礼还远远不够，“仁”的另一个特点——求仁，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是由自己决定的，不依靠外力和他人。礼乃是属于社会伦理规范的制度，而仁则属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品质。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就是说，人如果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是不能彻底贯彻礼乐的，仁乃是礼的精神支柱。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专心培养仁的品德，便可以消除恶的行为。

“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孔子的论述中，“仁”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所谓“爱人”也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一以贯之，忠恕之道”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孔子“仁”的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发现了“人”。这一方面固然是孔子对远古氏族统治体制中的民主性及人性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顺应了春秋末期的历史趋势。当时“人”的发现，是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即解放了的奴隶变成农民，由会说话的工具取得做“人”的资格。孔子所说的“爱人”，在某种意义上包括劳动者在内，所以说体现了时代精神。当然，孔子的爱人主要是将忠君、孝亲、敬长、慈幼这一套伦理道德推而广之，使人人自觉遵守，它是以严格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内容的。但这种学说客观上包含了对劳动者要宽容这一内容，即施行惠民政策，把劳动者当人看待，是顺应奴隶解放的趋势的，无疑有进步意义。

（二）礼的思想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礼的意义在古代至为广泛，它包括国际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宴、飨的典礼，也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周礼的基本内容乃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由于当时等级制度的混乱，孔子试图以理想标准的“名”来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情况的“实”，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

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就是说，重新肯定周朝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最关键的一步在于“正名”。不同名分的人有不同的道义准则。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处于君这个地位的人，应该具备君这个名称的人应有的品行，得到君这个名称应有的对待；处在臣这个地位的人，应该具备臣这个名称的人所应有的品行，得到臣这个名称的人所应有的对待。而在家庭关系中，要坚持“亲亲”的原则。孔子的这种思想，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提供了思想依据，所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贯彻其内在精神。他曾感叹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当林放问礼之本时，他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蒞，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孔子试图以教化的方式使西周的道德准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自觉意识，从而能够心甘情愿的遵循社会的制度、法令和礼仪。孔子提出的这一方法影响极为深远，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试图运用这种方法以取得最佳的统治效果。

孔子崇奉、维护周礼，但对周礼并非是无条件的因袭，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周礼的思想内容有较大的发展和补充。例如，周代的礼帽是用麻料做的，可是后来大家都用丝料做，对于这种改变，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按照周礼规定，童子死后，只能以简单的“殯”礼来办丧事。可是鲁国的童子汪，死在抗击齐国入侵的战场上，因他有功于国家，人们不愿用“殯”礼葬他。当问及孔子时，孔子回答：“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殯也，不亦可乎。”（《礼记·檀弓下》）其次，孔子对周礼的发展与补充还表现在加强思想统治上，主张用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来维持等级制度。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这里，孔子高度赞美了德政的作用，就像众星都围着北极星转一样，德政受到民众的欢迎从而使治理变得容易。德政是与刑政相对而言的，实行德政即是实行教化。



德政的内容是“惠民”，使民能够维持生活和生产而不至于冻馁。具体办法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包含着减轻剥削；“使民以时”即不违农时，使生产有所发展。节用爱民，使民以时，使庶民富裕起来，然后再施以教化，就可以取得德政的效果。

（三）孔子“教”与“学”的思想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发愤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一再赞扬好学的颜回，称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孔子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孔子往往施于不同的教育方法，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因为子路是急性子，而冉有是慢性子。孔子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最珍视的传统之一。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孟子生平思想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行录。不同的是，孟子参与了《孟子》七篇的写作与编辑。据《史记》记载，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城人，受业于思之门人。曾游事齐宣王、梁惠王，因不能用，退而与其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思想及其性格表现、为人原则，都保存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孔子非常谦和，对待人温良恭让，而孟子则是盛气凌人，性格刚直。例如，他正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告诉他，说自己感冒了，如果一定要见，他就勉强上朝。孟子马上便气了，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第二天齐王派医生来给他看病，他却跑到朋友家吊丧去了。孟子要离开齐国，有个朋友替齐王挽留他、谏劝他，他却伏在靠几上睡起觉来，并说，你应该去劝齐王学会对待贤人，不应该来劝我。孔子是“畏天命，畏大人”，孟子则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完全不把大人放在眼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浩然之气”所起的作用。这“浩然之气”是内中聚集的正义生出来的，义与道而并行，因而有了“至大至刚”的特性，

使人有充满“天地之间”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自然就气壮起来了。《论语》中洋溢的是“圣贤气象”，《孟子》中所体现的则是“大家气概”。唐韩愈《原道》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一论述确定了孟子在道统中的位置，也为《孟子》一书列入经典行列提供了依据。

孟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他是“王道论”者，要求统治者对百姓施行仁政，关心民生；在哲学上他是“性善论”者，认为辞让、羞恶、是非、恻隐之心是人生来皆具的；在道德思想上他是“仁义论”者，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人应该守住这颗心，坚持这条路。有人把“性善”认作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朱子）曰：“《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也有人把“仁义”认作孟子思想的核心（如张岱年先生），但《孟子》书中最闪亮的还是他的“民贵”思想。他最让世人震惊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来“民本”思想是传自尧舜的传统政治思想，这在《尚书》中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此明确把“民”放到第一位，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还是第一次。孟子无论谈王道，还是谈仁义、谈性善，其意义指向似乎都在一个“民”字上。比如“王道”，怎样才能王天下呢？“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落脚点在“保民”。再看“仁义论”，国君仁义，则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施行“仁政”。仁政的目的，仍在“保民”。“性善论”其本质是哲学的，而其实际仍在于政治，推恩施仁，则可以保天下，终端仍在于民。“民”字在《孟子》中出现两百余次，可以看出其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在《论语》中，孔子是对着一般人说话的。《孟子》中，孟子多是对着国王说话的。他对那些统治者谈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样爱护老百姓。他理想中的圣王文王就是爱民如子的最佳典范。他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独。’”（《梁惠王下》）又说：“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尽心上》）“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离娄下》）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文王有事，民乐为之，这就为王者树立了榜样。他认为为国者最急之务，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上》）。老百姓生活无着落，自然就会出现违法行为。“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贤君在上，必然是“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凡事应该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例如，国君选拔贤人，国君左右的人及朝中官员都说他好，这不行，老百姓说这人不错，才值得考虑任用他；左右臣僚及官员们都说这人不好，这不可信，只有老百姓说他不好，才值得考虑免其职。国人都说这人可杀，那就得考虑把他杀掉。出征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人欢迎你，你就可征伐。守卫国土，百姓愿意与你一同坚守，那就可守，百姓不愿守，想守也守不成。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多以为孟子这些话都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考虑的，但认真分析一下，则并非如此。因为国君的命运与孟子并没有关系，孟子也不必去关心他们的死活，而天下苍生的命运，却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牵挂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并不是为了天子，而是为了天下，为了天下苍生，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伟大之所在。因此，推行仁义的孟子理当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统治者讲话，也正

因如此，他对暴君就特别憎恶。他明确地表述君臣的对等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对于“寇仇”自然就不存在君臣之义的问题了。因此武王诛纣，理在必行。“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他又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离娄上》）他对助纣为虐之臣，也很不客气，如云：“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一强战，是辅桀也。”（《告子下》）这是对他的爱憎立场的说明。

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开首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司马迁是由《孟子》开篇一段话而引发的感叹。《孟子·梁惠王上》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里提出了两个相对对立的概念，即“利”与“仁义”。“利”讲聚敛，对于天下国家来说，言“利”则必谋利，谋利则必争利。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的利益，如果各为其利而争，其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所以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司马迁说：“利诚乱之始也！”争相夺利，国不亡则危。相反，仁义是要付出、要贡献的，在朋友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仁义之道讲的是礼让，因而天下国家，多一份仁义，就会多一份安乐。孟子之所以要把这一章放在全书之首，关键是他看到了争利为天下带来的灾难。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无非皆为了一个“利”字。但为这一个“利”字，却使天下处于水火，使人类文明之车开往了背离人类愿望的方向。孟子的这个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的普遍观点。中国人之所以一再强调“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正是为了天下万世考虑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物质追求会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但考虑人类万世的生存，只能是扬仁义而抑利。当下，来自西方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双重破坏，给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痛的教训，使西方的哲人们不得不考虑从中国经典中汲取智慧，以求得人类继续生存的可能。

总之，孟子的“民贵”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尚书》以来的民本思想，也代表了中国政治理论健康的发展方向。有人指责孟子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这自然与这个时代倡导民主政治有关，但是否有点儿在苛求历史呢？

第二节 儒家的君子人格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于道德的充实、人格的伟大、情操的完美

非常重视，孜孜以求。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强调有德行的人要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外在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当然在表述上，儒家也用“贤人”“圣人”“大丈夫”等词语来表达其理想人格。两千多年来，“君子人格”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在人格修养上的重要目标，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

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孔子对作为“君子”的人格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君子”呢？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谦地说“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到：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概括起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仁爱精神。君子之可贵，就在于其德行可敬，是集众善于一身的，是社会德行的象征。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仁是全德之称，在君子应具备的“仁、义、礼、信、忠、孝、悌、宽、恭、恕”等多种美好品格当中，“仁”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关心、爱护、尊重他人乃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精神。这种仁爱精神，正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就是说，“君子”首先应该是“仁”的实践者，成为一个“仁人”，如果抛弃了“仁”，“君子”就不可能称之为“君子”。

第二个特征是济世情怀。在儒家看来，圣贤除了在个人心性道德修养方面臻于完善外，还要把“内圣”进一步体现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要为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而进取不息、奋斗不止。也就是说，君子是治国、平天下的中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国家能否得到治平，就取决于君子的多寡，以及能不能行君子之道，君子多，社会风气良好，则国家可治，天下可平。否则，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人们就不能安居乐业。所以，二程认为：“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官吏乃至君王，最好都能具有君子人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

第三个特征是中庸的品质。“中庸”又称“中道”“中行”，是指人的言行不偏于对立的任何一方，使对立双方互相平衡、互相补充，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在儒家看来，这种中庸之道是圣贤所必须掌握的。与此相区别，有“狂”与“狷”两种对立的品质，狂即狂妄冒进，狷即拘谨退缩。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为圣贤君子，必须具备中庸的美德，避免流于狂狷。而如果能够按中庸的要求，喜怒哀乐、行为举止无不恰到好处，还能不为人知，不被世人认可，且能无怨无悔的话，那就达成了人格的最高境界——圣人。“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第四个特征是注重气节操守，富有献身精神。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注重气节与操守的观念对后代影响很大，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此外，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